百年莫干 ◎ 朱炜

陈云与莫干山:休养犹思裨国事

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永远铭记。他一生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党性原则、坚持勤奋学习、秉承求真务实作风、深具朴素公仆情怀。他的这些优秀品质不独反映在工作中,也体现在疗休养中。

一、陈云1953年莫干山休养

陈云是南方人,出生于上海,钟爱杭州与苏州,谙熟江南文化,长期关心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建设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多次到杭州调研、视察,即便是来杭州休养,每次都匆匆,但对杭州的印象越来越深,以致晚年欣然题词"杭州是好地方",破例为云栖竹径题写景名。位于杭州北部德清县境内的莫干山"遍地是修篁,夹道万竿成绿海","竹"为莫干山"三胜"之首。陈云1953年至莫干山休养,正是从杭州云栖而上莫干山,对于两地的观感庶几是一致的。作家叶永烈曾问陈云夫人于若木,这是不是因为陈云喜欢竹子的缘故。于若木点头说:"的确,陈云很喜欢竹子。"陈云的子女也表示,父亲喜欢"一眼望不到头的竹林",在竹林小径散步思考。

陈云关于名胜有独到的认识,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名胜的形成是要具备一些条件,不具备就不能被人承认是名胜。名胜有好有次,也是条件决定的。条件一是自然山水林木要有特色。二是要有人为的加工,加工的程度越大、历史越久,名胜也就越好。三是要有文物价值,如名人住所、碑刻、题诗等等;杭州的名胜是具备这些条件的。""宣传也可以算一条。"按以上四个条件,莫干山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0世纪50年代初,财经斗争硝烟才散,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接踵而至,陈云积劳成疾,病倒了。有关方面建议他去苏联疗养较为有益,但由于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刚起步,百端待理,他选择了到杭州休养。1953年5月7日至6月12日,陈云在杭州,经过一个多月的休养,他的身体情况略有好转。6月21日至6月24日,陈云赴莫干山休养,其间接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转来周恩来总理的电报。当时正逢"一五计划"实施之始,粮食短缺问题日益突出和紧张起来,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上对粮食问题进行了讨论,但与会者意见不一。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想到在党内陈云的意见是具有权威性的,于是专就粮食问题发电报征求陈云的意见。周恩来在电文中说:"此事关系颇大,你过去考虑较深,请提出意见,以便中央通盘考虑做出决定。请视身体情况,简复。"

陈云收到电报后,认真分析了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上对于粮食管理与供应问题的不同意见,并决定提前结束在莫干山的休养,于6月24日回到杭州。6月25日,陈云复电周恩来,提出自己的建议,主张对于粮食管理和供应仍维持由中央统筹统支的办法,略增地方机动性。这就是收入《陈云文选》中的《粮食要统筹统支》。陈云的建议,很快得以贯彻实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认为统购统销对调节供求关系,稳定市场物价,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建设,完全是必要的、适时的。联系陈云从革命战争时期发动农民实行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根据地,鼓励农民交公粮、出卖余粮;到这一时期主张粮食要统筹统支,统购统销,使全党重视粮食工作;再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要进口一些粮食,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粮食还是第一位的。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系列重要论述,始终贯穿了他关于解决民生问题是重要国策的思想。

正如电视专题片《陈云在浙江》解说词中所说:"人们在探究这段似乎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的历史时,或许会发现统购统销这一重大决策与疗养胜地莫干山和陈云留在山上的足迹有着某种联系。"陈云因上莫干山休养,与这座名山产生了不解之缘,难忘莫干山,关注莫干山。

二、陈云与苏州评弹艺术研究会莫干山年会

陈云是评弹艺术的"知音",被尊称为"老听客",评弹艺术工作曾长期在他的爱护和关怀之下发展。尽管陈云不止一次谦虚地说:"我听书和搞经济工作不一样。经济工作是我建国以来分工从事的工作,是用全副精力去抓的。评弹是我的业余爱好,随便谈谈的。"可是,评弹界无不知他出于对保护、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心,他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去看待评弹艺术发展的。"评弹要像评弹的样子,可以有所改进,但不要……改掉评弹的特色""现在要说新书,这是时代的需要"……1977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由陈云提议,并征得文化部的同意,江、浙、沪两省一市在杭州召开评弹座谈会,虽仅吴宗锡、施振眉等7位评弹界代表参加,但陈云亲自主持,重要性不言而喻。会议的成效在之后几年逐渐显现。

1978年夏,浙江省曲艺团全体苏州评弹演员在莫干山创作、排演了中篇苏州弹词《新琵琶行》,后赴北京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国庆30周年文艺调演,获创作二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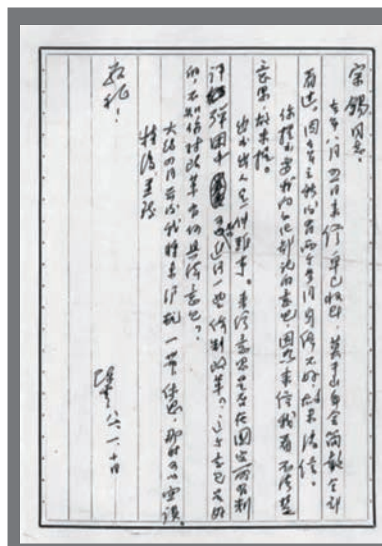
1980年7月24日至7月30日,苏州评弹艺术研究会在莫干山举行第一次年会。与会代表重点探讨了苏州评弹如何推陈出新和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及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书目的建设,艺术水平的恢复,人才的培养。这年8月5日,吴宗锡给陈云写了一封信,汇报评弹研究会莫干山年会的情况。改革开放初期的陈云工作十分繁忙,在收到吴宗锡的信后,他仔细看了年会的每一份简报和发言稿,没有马上复信,而是深入分析了评弹问题的内外因素。半年后的1981年1月10日,陈云给吴宗锡复信,信中称"莫干山年会简报全部看过",并将简报内容提炼为"出书出人",又直指"出书出人是件难事"。

三、陈云提出"出人、出书、走正路"

1981年,陈云再一次表态支持评弹,并为复兴评弹提出若干准则。1981年4月5日,陈云在上海休养期间找来吴宗锡谈话,概括地讲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这句振兴评弹事业的名言。陈云如是强调"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逐步提高、增加""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什么是正派的评弹艺术?在陈云看来,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处理好适应观众和提高观众的关系。施振眉撰文回忆:"事后才知陈云同志仔细地看了这届年会的每一份简报和会上的发言,在了解了各种看法后,又亲自作了调查,广泛听取意见,直到1981年4月5日,才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这一振兴评弹的重要意见。这七个字是对发展和振兴评弹事业的最简练最精辟的概括。这不仅对评弹,而且对戏剧,对开创文艺工作的新局面都是共同的必由之路。"

陈云多年来有关评弹的谈话和通信被编辑成《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经中国曲艺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这部著作不仅对我国评弹艺术在建国后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对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1985年5月1日,陈云在江华、王芳、薛驹、李丰平等浙江省主要领导陪同下,在杭州西子宾馆观看了浙江省曲艺家协会理事、德清县评弹团演员张雪麟与夫人严小屏的演出,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演出的节目是张雪麟夫妇自编的长篇历史传奇弹词《董小宛》,共三十余回,六十万字。此"新书"在苏南、浙北和上海一带演出时,博得了听众的赞赏,是张雪麟的保留节目,曾获浙江



陈云书信 提到苏州评弹研究会莫干山年会

省文联颁发的鲁迅文学基金奖一等奖。缘此,张雪麟精心挑选出了《董小宛》中《参相》一回,因这一回人物集中,情节曲折,适宜双档演出。演出开始,张雪麟轻捻丝弦,先放了一只噱头,而后施展起说、表、弹、唱的全套功夫,淋漓尽致地演唱起来。曲终琴歇,掌声四起,陈云与张雪麟夫妇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问及两人来自哪个评弹团?张雪麟答,是德清县评弹团。陈云听罢,发出健朗的笑声,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很难想象当时一个县级评弹团演员能达到如此高的艺术水平。

张雪麟后来回忆:"我们就是遵照出人、出书、走正路,埋头苦干,四年多的辛勤耕耘,三十余回的长篇弹词《董小宛》在书台上树起来了。三年中在上海演出十六遍,评论家写文章称赞我们是演不败的《董小宛》。当然这是对我们的鼓励,但也确有成功的一面。"

不由得想起张雪麟在1986年在湖州演出,有一天,从书台上下来,见到去看望他的朋友说:"你知道什么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现在,就是现在!我现在听到听众为我拍手的声音,是我做人最适宜的时光。"他还说过:"艺术是在实践中提高的,我的演出……一年到头,马不停蹄,还要挤出时间来编书。演员只有在台上磨炼,才能提高。不演出,哪有成就?"

今时今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文化建设亦与时俱进。钩沉陈云1953年赴莫干山休养以及1980年促成苏州评弹研究会莫干山年会史事,学习他休养犹思裨国事的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重温他对粮食问题与评弹艺术的相关论述,能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今天的三农问题和文艺事业。特别是那句"出人、出书、走正路",对于引领新时代青年的成长成才,犹有启迪和教益。

文化随笔 ◎ 杨晓

玄都观的桃花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唐元和十年,因八司马事件被贬远州的刘禹锡被召还京,和友人一起到玄都观赏桃花,写下了这首诗。诗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桃花盛开,游人如织,诗人心生感叹:这千树桃花都是自己离开京师后所栽种的。

有意思的是此后刘禹锡再度被贬,十年后重游玄都观,又赋诗一首,"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当初的刘郎再归来时,已是十年之后,曾经的繁华不再,如今是一片破败。

刘禹锡的生平可谓波折。他博学多识,少年得志,为官政绩也不错,但身处政治旋涡,备受挫折,连续谪迁,特别是八司马事件让他吃尽了苦头。诗人最真实的感触我们已无从体会,但时隔多年,重游故地,感慨万千。十年之前眼见繁华而发出"尽是刘郎去后栽"的感慨,十年之后"前度刘郎今又来。"桃花却不知所踪。两首诗对比下来,会发现玄都观的桃花反倒成为了一种意象,通过它的繁华与颓败,我们看到的是时间的流逝和人生的无常,让人心生斗转星移、满心苍凉之感。我特别喜欢诗中"刘郎"一词,自然是诗人的自我称谓,却透露着一种落寞和自嘲。

历代的很多注释都称"桃千树"暗指新崛起的权贵,来传达诗人心中的愤懑与不平,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总觉得有点牵强。

古代党争很常见。读《苏东坡传》,王安石变法,一直受到司马光、苏轼等的否定。新法终止后,司马光重新受到重用,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被罢相,而在此时苏轼却又支持新法,旋即被排挤出京。刘禹锡的境遇与王安石和苏轼在这一点上很相似。如今我们称王安石是改革家,司马光是政治家,苏东坡也堪称伟大的人,如此这般,我们能说王安石是新贵?抑或苏轼是新贵?

人事有代谢,往来无古今。只能说刘禹锡我们太熟悉了,他的《陋室铭》是千古名篇。他的诗我们读的很多,"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里读到了他的豪气,"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里读到了他的柔情。经典熏陶之下,我们潜意识里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好"人,而过分夸大其个人的重要性,认为其所做所为就是对错的准则,继而去轻易否定其他人,也因故使得玄都观的桃花莫名背了黑锅。"我只是一朵寻常的小花而已,何故遭此骂名?"或许那些桃花会这么想。刘禹锡估计也会想,我只是看看花,表达一下对于人生的无限感慨而已,何故要强加上时代的包袱?要笑话后人的自作多情和无理歪曲了。

古诗欣赏,历代注释囿于时代的背景,赋予诗歌强烈的感情色彩,或可作为参考。但时代在变化,对于诗文的理解或许更应回归其本身,需要读者带着自己的思考和审美,去尝试体会诗人本人的真实感受,发现诗歌自身的美感所在。就像此两首诗,娓娓道来,不用过分的感情渲染,一句"刘郎"的自我沉吟,就让人身临其境,陡生感慨。我觉得这是这两首诗中最打动我的地方。

"人生如觉不如意,请你读读刘禹锡。"都说刘禹锡是那种骨子里透着豪放的气魄的人,眼界很宽,其本人也被冠以"诗豪"的名号,料得他也不会动不动拿着这些桃花来含沙射影。有道是个人际遇因时而异,情随事迁,看到玄都观的桃花,繁华也好,颓败也罢,直觉时光倏然,睹物生情,豪气的"刘郎"也是禁不住无限感慨吧!这两首诗更多是个人情怀的自然流露,豪爽如诗人者,又岂真在乎"新贵"为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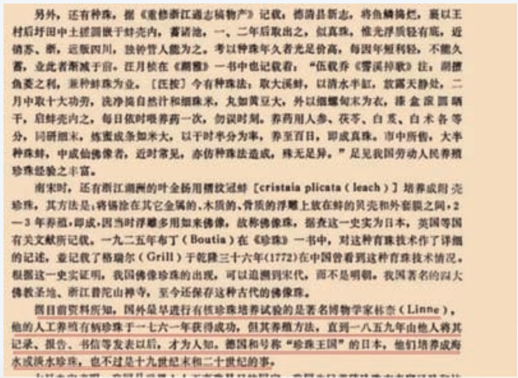
12 德清有名珠 "德清珍珠系统"全力冲刺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德清自古水域面积广阔、水资源丰富,因其历史悠久的珍珠养殖,孕育了独特的农业文化遗产。2017年,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成功申请成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9年该系统进入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现正在冲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为纪念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20周年,传播"世界珍珠之源",我们特别策划《德清有名珠》专栏,探究"德清珍珠系统"这颗闪亮"明珠"的历史考证。

中国人工育珠是如何起源、传播及发展的?(一)

神奇的瑰宝珍珠,自古以来就闪耀着无与伦比的光芒,它是皇室贵胄身份和地位尊贵的表征,是宗教中代表灵智、神秘和法力的象征物,也是天然的药用和保健珍品。现代的人们更是赋予了珍珠新的寓意,将其视为健康、纯洁、富有的代名词。



另外,还有种珠,据《重修浙江通志稿物产》记载:德清县新志,将鱼鳞捣烂,裹以王村后圩田中土搓圆嵌于蚌壳内,蓄诸池,一、二年后取出之,似真珠,惟光浮质轻有底,近销苏、浙,远贩四川,独钟管人能为之。考以种珠年久者光足价高,每因年短利轻,不能久蓄,业此者渐减于前。汪月桢在《湖雅》一书中也记载着:"伍载乔《雪溪掉歌》注:湖撒鱼菱之利,兼种蚌珠为业。〔汪按〕今有种珠法:取大溪蚌,以清水半缸,放露天静处,二月中取十大功劳,洗净捣自然汁和细珠米,丸如黄豆大,外以细螺甸末为衣,滕盒浪圆晒干,启蚌壳内之,每日依时喂养药一次,勿误时刻。养药用人参、茯苓、白芨、白术各等分,同研细末,炼蜜成条如米大,以干时半分为率,养至百日,即成真珠。市中所售,大半种珠蚌,中成仙佛像者,近时常见,亦仿种珠法造成,殊无足异。"足见我国劳动人民养殖珍珠经验之丰富。

南宋时,还有浙江湖州的叶金扬用褶纹冠蚌〔cristaia plicata(leach)〕培养成附壳珍珠,其方法是:将锡涂在其它金属的、木质的、骨质的浮雕上放在蚌的贝壳和外套膜之间,2—3年养殖,即成,因当时浮雕多用如来佛像,故称佛像珠,据查这一史实为日本、英国等国有关文献所记载。一九二五年布丁(Boutia)在《珍珠》一书中,对这种育珠技术作了详细的记述,并记载了格瑞尔(Grill)于乾隆三十六年(1772)在中国曾看到这种育珠技术情况。根据这一史实证明,我国佛像珍珠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宋代,而不是明朝。我国著名的四大佛教圣地、浙江普陀山禅寺,至今还保存这种古代的佛像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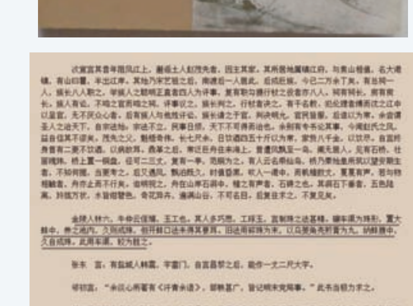
据目前资料所知,国外最早进行有核珍珠培养试验的是著名博物学家林奈(Linne),他的人工养殖有柄珍珠于一七六一年获得成功,但其养殖方法,直到一八五九年由他人将其记录、报告、书信等发表以后,才为人知。德国和号称"珍珠王国"的日本,他们培养成海水或淡水珍珠,也不过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的事。

▲1994年《珍珠史话》记载了叶金扬培育附壳珍珠的方法和林奈的珍珠培育试验

中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珍珠的国家,也是最早进行人工育珠的国家。有记载的中国人工育珠始于十一二世纪,而珍珠规模化生产则出现在十三四世纪。国外的珍珠培育比中国稍晚。17世纪中后期,林奈在中国附壳珍珠养殖的基础上培育出了有柄珍珠,成为西方珍珠培育的先驱。18世纪,旅行者们陆续将中国附壳珍珠培育技术介绍到国外。19世纪,日本的御木本幸吉根据我国佛像珍珠育成原理,经过多年研究,首次培育出半圆附壳珍珠,后在见濑辰平和西川藤吉的共同努力下,日本培育出正圆游离珍珠,奠定了日本现代珍珠产业的基础。到了近代,由于战争等原因,我国珍珠养殖业开始没落。新中国成立后,在将中国传统珍珠养殖方法与日本现代珍珠养殖技术结合的基础上,经过熊大仁和沈志荣等国内研究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化的珍珠培育技术逐渐形成。

北宋,开世界人工育珠之先河

关于珍珠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古籍《尚书·禹贡》。其中,在淮海一篇中,就有"淮夷蠙珠暨鱼"的记载。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珍珠就成为贡品。人工育珠的记载则最早出现在十一二世纪。北宋时,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记载了珍珠养殖方法:"礼部侍郎谢公言有一养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择光莹圆润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开,急以珠投之,频换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华,玩此经两秋,即成真珠矣。"这种利用假珠(珠核)进行育珠的方法开创了有史以来人工育珠的先河。但《文昌杂录》并没有交代珍珠养殖方法的来源及规模,因此无法判断出珍珠的形成是偶然为之,还是当时的人们已经了解了珍珠形成的原理。到了南宋,湖州就出现了附壳珍珠的常规化生产。今天被人所熟知的养殖方法产生于十三四世纪,他的发明人叫叶金扬,是当时的湖州府人士。叶金扬的附壳珍珠培育方法为:"将锡和其他金属的、木质的、骨质的浮雕放在蚌的贝壳和外套膜之间,经2~3年的养殖,即成。"



▲刘廷献《广阳杂记》

后来,随着清朝的没落,中国的珍珠养殖业渐趋衰败。鸦片战争后,日本对中国的珍珠养殖进行严格控制,中国的珍珠养殖业一度没落,附壳珍珠的培育技术自此失传。

文章原标题:《中国人工育珠的起源、传播及发展》,原文刊载于2015年《浙江农业科学报》)